

社区与文化

——吴文藻“社区研究”的再回顾

□ 齐 群

内容提要 在社会学研究方法日益多元化的背景下,“社区研究”逐渐成为诸多研究方法中的一种;然而这一概念在引入中国之初曾被学者作为中国社会学研究的整体性视角。作为“社区研究”的奠基性人物,吴文藻是理解这个概念的关键。在他的思想体系中,“社区”是以“文化”的形态出现进而作为抽象的“社会”的具体呈现,从而达成吴文藻对中国现实的总体性问题的关怀与理解。回顾“社区研究”的意义就在于,从吴文藻的社会思想入手,在考察他的总体思想框架后再去理解“社区”、“文化”在他那里的涵义,从而把握他的社区类型学划分。

关键词 吴文藻 社区研究 文化

作者齐群,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硕士研究生。(北京 100088)

引论:超越学科范畴的“社区研究”

“社区研究”是中国社会学、人类学最为重要的学术资源之一。特别是在中国大陆的社会学、人类学学科重建之后,受费孝通先生的影响,新一代学者一度将“社区研究”作为考察中国社会现状以及中国转型状况的主要范式与途径。随着社会学学科发展与国外社会学的不断引介,中国社会学学科的研究范式愈发多元化,例如“行动的文化阐释”、“非结构的权力关系分析”以及“现象学社会学路径”等等。在这些后起的范式面前,“社区研究”似乎落伍并有些缺陷:理论前提过于宏大,研究方法具有逻辑缺陷,等等。尽管有学者试图通过学习布洛维的扩展个案法,以将“个案研究对象与总体性背景相结合”的方式重新将社区研究的精髓带回到当下的经验研究中来。^①但是很显然,我们已经失去了老一辈学者试图用“社区研究”来把握中国社会总体状况进而改造中国社会的宏大关怀与信心。因此,我们有必要

重新回到民国的社会学人类学语境中去,去考察费孝通先生以及他的老师吴文藻先生何以选择“社区研究”作为终身秉持的学术方法,以及这个选择与他们对中国社会的总体理解有什么关系。

吴文藻先生是中国社会学界最早大力倡导“社区研究”的学者,第一个提倡将“社区研究”作为整体理解中国社会状况、进行中国社会学实证研究主要方法的人。他的努力为日后费孝通、林耀华等一批学者实践开创中国社会“社区研究”的典范奠定了基础。因此,理解吴文藻的“社区研究”就成为我们理解民国时期社会学人类学界对于中国社会总体思考的一个关键途径。

在这里,民国时期社会学、人类学和民族学界一场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学术争论可以为我们提供理解吴文藻的一条线索:1939年,由于抗日战争的影响,傅斯年率史语所迁驻于昆明;同一时期吴文藻与费孝通等人也因战争原因而到云南大学进行研究。受历史学影响极深的傅斯年就对吴文藻、费孝通在云南进行的边疆民族研究进

行强烈批评,他眼看周边云南人都自称汉人,因而认为实无必要对他们的民族归属追究根底。他主张在此民族危亡之际,大家应该坚持“中华民族是一个”。而吴文藻、费孝通从事的人类学、民族学,特别是基于少数民族分类的学问,被傅斯年看作是无聊学问。^②可见傅斯年认为,单纯的“社区研究”会导致对中国的碎片化理解,并忽视历史在中华民族形成中的作用,进而扭曲中国的历史、政治叙事,而这对于正处在抗日艰难阶段的中国来说可能十分危险。

以往我们理解吴文藻的社区研究都是从“社会学中国化”的角度入手,上面这个争论启示我们,对于吴文藻的“社区研究”,我们单纯在社会学的学科内部理解是不够的。吴文藻在学术方法的选择背后,有着强烈的个人对社会的总体性的关怀和理解,由此才能解释吴文藻为何在面临抗日战争艰难局面与国内其他学者的强烈批评的情况下仍坚持进行他的“社区研究”。这篇文章将试图通过对吴文藻的社会思想的讨论入手,去理解吴文藻的社会类型学划分、文化观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社区研究”方法。

一。“社区”与“社会形态”

说到“社区研究”,就必然和社会学的“燕京学派”离不开关系。早在吴文藻先生学成回国之前,燕京大学就已经形成了一套自己对于社区独有的关怀。这要归功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创建者——步济时(John S. Burgess, 1883~1949)。作为传教士,步济时一直充满了基督教式的对于社会底层的关怀,并在华身体力行推广慈善事业,这也是社会工作在专业化之前的主要形式。为此他曾经执导北京高校的学生进行北京人力车夫的调查,并被认为是中国第一个系统的社会调查。^③燕京大学的前身是四所教会学校,合并之后又有司徒雷登这样有力的领导者,这对于正在寻找能够培养和训练社会服务人员的步济时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在他的主持下,由北平基督教男、女青年会与燕京大学合作,建立了社会学系。步济时倡导的教学、科研、服务三者并重也在课程安排中得到了体现:建系之初就开设了两门课程——社区组织、社会调查。

吴文藻早在1927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读博士

的时候与步济时结识,1929年回国时便受邀加入燕大社会学系。随着吴文藻先生在燕大社会学系的影响日益深厚并成为社会学系的主任,他给燕大社会学系的社区调查传统注入了新的内容,这也是日后社会学中国学派的基础。作为一个传教士,步济时并不是社会学专业出身,而吴文藻则接受了完整的社会学训练,并广泛接触了政治哲学、人类学等学科。^④吴文藻注入的新东西主要包括两点:首先是以芝加哥社会学派都市研究为基础的社会观以及社会与社区关系,其次是芝加哥学派倡导的人文区位法和英国的文化人类学提倡的文化概念以及民族志研究方法。这二者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前者构成了吴文藻先生对于当时中国社会存在的整体性与根本性问题的判断,后者则为吴文藻先生研究、解决他认为的社会问题提供了专业知识、概念、技术等方面的资源。这里首先来讨论第一点。

当我们谈起吴文藻的“社区研究”,一般都是从方法层面去探求其根源,^⑤而很少去考察他背后的思想基础。尽管在后来的时间里吴文藻颇为重视“文化”这个人类学概念,但是他的问题出发点仍然是社会学的:在当时有哪些社会的类型?什么样的社会类型将更加有利于国家发展?而中国处于什么样的类型之中,进而会遇到什么样的社会问题?在这一问题上,芝加哥学派的都市研究,特别是派克(Robert Ezra Park, 1864—1944)对吴文藻有着深刻的影响,1932年,吴文藻专门邀请派克来燕大讲学,并编印了派克的论文集。

派克的影响首先体现在“社会—文明”的类型学划分。吴文藻在论文集的导言中写道“他(派克)深信都市为文明发源之地,欧美近代文明乃是都市文明,近代社会乃是都市社会,近代人乃是都市人,近代社会问题根本就是个都市社会问题。”^⑥派克的这一点认识被吴文藻接受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日后的研究。这一观点将社会形态与文明形态联系在一起,从而使得一国的社会得以在文明体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派克将这一观点应用于中国则认为“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根部的不同乃是乡村社会与都市社会的不同,亦是农业社会与工商社会的不同”^⑦;而吴文藻对这一论断深以为然,因为这与他对中国社会的判断颇为相符。由此奠定了吴文藻对于中国社会类型以及

他对于社会发展方向的判断。

派克的影响另一方面则体现在更加具体的社会学面向上,即如何将“社会—文明”的类型学划分落实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派氏始终觉得美国社会不是农业社会,而是工商社会,欲明了美国社会的本质与特性,必从研究都市社区起始。……故欲明了近代文明、近代社会、近代人以及近代社会问题,必先明了近代都市生活与都市环境”,“他(派克)一走进以农为本的中国,他就立刻觉得中国社会学者……还应集中精力,来研究乡村社区”。^⑧如果说社会和文明的概念尚为抽象,而仅能进行哲学和历史学的探讨,那么“社区”这个概念就更为经验化。“简单的说,社会是描述集合生活的抽象概念,是一切复杂的社会关系全部体系之总称。而社区乃是一地人民实际生活的具体表词,它有物质基础,是可以观察的到的。”^⑨

二.“社区”与“社区研究”

正如前面提到的,吴文藻将他对中国社会的总体关怀落实为对社区的研究。同时,吴文藻认为社区研究的内容就是“文化”,所以吴文藻的“社区研究”并不是我们一般意义上的空间性的一村、一城的社区研究,而是一定空间区域、一定人口下的文化研究。

首先来看“社区”的内容。吴文藻认为,社区“指一地人民的实际生活而言,至少要包括下列三个要素:(一)人民,(二)人民所居地域,(三)人民生活的文化”。^⑩社区的第一要素“人民”,以及经验上表现出来的人口密度是人们认识社区大小的第一步。社区的第二要素“地域”则区分了基本的社区类型:部落社区、乡村社区、都市社区。

重要的是社区的第三点要素,同时也是社区研究的核心,即“文化”,因为“明白了文化,便是了解了社会”。吴文藻认为,“文化最简单的定义可以说是某一社区内的居民所形成的生活方式,所谓方式系指居民在其生活各方面的业果”,“文化也可以说是一个民族应付环境——物质的、概念的、社会的和精神的环境——的总成绩”。^⑪吴文藻的这种认识超越了传统西方的“物质”或“精神”的文化一元论,同时也没有落入“心—物”的

文化二元论窠臼。他将文化的分类进一步扩展为四个方面:物质文化(物质生活)、象征文化(语言文字)、社会文化(社会组织)、精神文化(宗教文艺)。当然吴文藻同时指出这种分类仅仅是为了考察解剖文化而定,并不是文化实体的全部。因为从功能论的角度来看,文化实体是一个“有机整体”,是全部同时发生作用,不能机械分开(下文详论)。

其次,我们再来看“社区研究”。在内容上,吴文藻认为“社区研究”表明这个概念不同于之前简单的社会调查“社区研究较之社会调查要进一步,它不但要叙述事实,记录事实,还要说明事实内涵的意义,解释事实发生的原因。”^⑫在性质上,吴文藻认为社区研究是“现代社区研究”:因为社区是“文化在时间上和地域上的一个历史和地理的范围;……文化一面固有其地域性,一面尚有其时间性,而时间性的认识,较之地域性的认识,尤为重要。因为文化原为历史的产物。社区生活离开了时代背景,是绝对无法了解的”。^⑬相较于历史方法,吴文藻则更强调“社区研究”的现代性,即在时间上就当然地属于现代范围“所谓现代,就中国历史而言,是指海禁既开以后的一个时期,即从鸦片战争的前夕,直到现在。说的远些,也可以回溯到中西文化开始沟通的明末清初”,“因为现代社区是由近代社会蜕化而来的。”^⑭

吴文藻的社区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的是他对于社区的类型学的划分。前面提到吴文藻按照地域类型社区分为三类:部落社区、乡村社区、都市社区,而在吴文藻的眼中文化又是社区的核心,因此这种按照地域进行的类型划分其实带有文化上的总体性“部落社区是指以游猎和畜牧为主要生业的人民及文化而言,乡村社区是指以农业和家庭手工业为主要生业的人民及其文化而言,都市社区是指以工商制造业为主要生业的人民和社会而言。”^⑮因此,地域分布仅仅是社区文化的一种外在表现。吴文藻进一步将这种类型学划分与学科研究联系起来:部落社区是民族学研究对象,乡村社区是乡村社会学的研究对象,都市社区是都市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再回到第一部分吴文藻的总体社会观,他认为现代文明本质上乃是工商社会,因此所谓社区的三分法,实际上就是社区文化所代表的社会类型距离现代文明的社会远近程

度而言: 部落社会距离最远, 农业社会次之, 都市社会是现代文明的趋势。这种社会序列, 在空间上展现为都市、乡村与边疆, 在时间上则展现为从游牧到农业再到工业的历史发展进程, 凝结为社区即部落社区、乡村社区、都市社区。

这个类型区分体现了吴文藻的一个总体关怀, 即他认为多重社区与其代表的多重社会类型同时在当时的中国并存, 因为中国正处于激烈的变化时代: “一面是西洋文化的急速侵入, 一面是边疆民族的离心运动”。^⑩ 这就造成游牧、农业与工业三种文化在中国社会中并存, 于是进行这三种社区类型的研究乃是对中国现实把握的最直接有效的途径。这也是吴文藻后来的宏伟计划: “如欲为中国社会生活的科学研究, 树立一个稳固的基础, 就得同时举行以下几组研究: 第一组, 在中国各地方慎选五六十个可代表的村落, 来做精密的考察。第二组, 在中国边疆择定若干非汉民族的地方社区, 做同样的考察。第三组, 扩大研究的单位, 以一省或数省乃至全国为范围, 而选定社会生活的某一方面做较概括研究。第四组, 对于海外各地华侨社会, 亦做类似研究, 研究时注意到各该华侨社区与祖国故乡环境的关系。”^⑪

三。“社区研究”中的“文化”

在具体研究方法上, 吴文藻认为, 社会学“即系应用类似自然科学上的方法——即比较法, 对于各地现存的社区, 做系统而精审的观察”。^⑫ 即从总体上看, 吴文藻对社会学的理解是从“比较”出发, 比较的内容则是社区。“现代社区的核心为文化, ……社会学便是社区的比较研究, 文化的比较研究, 或制度的比较研究。”^⑬ 因此, 吴文藻在开展社会学研究时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把握“社区”、“文化”、“制度”这一系列抽象概念, 进而能够转变成可实际操作的研究。这就不简单是一个方法的问题, 而是一个理论问题。

作为一个几乎完全从西式教育成长出来的学者, 吴文藻在面临实际学科问题的时候, 首先想到的就是国外多样的社会学、人类学学术资源。在当时, 社区文化的研究在方法上并不唯一, 吴文藻认为“在社会学上的实地观察法中, 尤以人类学上的‘功能法’与社会学上的‘区位法’, 对于研究中国社区较为适用”^⑭, 而这两种方法也是各有

所长: 区位法适用于“近代都市社会”的研究, 功能法则较适用“工业前期的各种社会”的研究。当时的中国在总体上仍是农业国家, 故而研究乡村的功能法是他最为重视的。这也是为什么在比较英法美德各国社会学理论后吴文藻最后选择了英国功能学派的理论。

经吴文藻力邀, 英国功能学派人类学大师拉德克利夫—布朗于 1935 年来华讲学。吴文藻曾讲“近两年来自己常常感觉到国内社会科学材料内容的空虚, 颇想利用此派的观点和方法来尝试现代社区的实地研究”。因为“功能派人类学是社会人类学中最先进, 而亦是现今学术界上最有力的一个学派”, “功能的观点, 简单地说就是先认清社区是一个整体, 就在这个整体的立足点上来考察它的全部社会生活, 并且认清这社会的各方面是密切相关的, 是一个统一体系的各部分, 要想在社会生活的任何一方面求得正确的了解, 必须就这一方面与其他一切方面的关系上来探索穷究”。^⑮ 可以说, 通过借鉴英国的功能主义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 吴文藻找到了他理想中进行中国社区研究的有效工具——以整体的方式来研究社区文化。

将社区作为一个整体来比较, 就意味着要对社区的文化进行总体的把握。在具体的文化内容分类与经验材料收集方面, 吴文藻深受马林诺夫斯基的影响。他曾指导他的学生费孝通翻译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论》, 并在此基础上写成“论文化表格”一文, 作为他实践社区研究与文化比较的总纲领。在这篇文章中, 吴文藻颇为赞同马林诺夫斯基对于文化的类型学划分: 三因子与八方面。^⑯ 吴文藻倾心于这种文化三分法的原因在于, 这样的分类能够便捷地从经验上进行把握: “物质底层可由器物下手, 社会组织可由制度下手, 精神生活可由语言下手。凡器物、制度和语言的现象, 都是纯粹客观的实在体, 可观察得到, 捉摸得住, 并可予以客体保存。”^⑰ 功能论主张这些不同的文化要素都是一个整体, 在这个整体的内部吴文藻则看到了不同要素的位置: 物质因子是基础, 社会因子是了解文化全盘关系的总关键, 精神因子是文化的核心。八方面则是作为这三个因子各自具体项目所发挥的功能而言。总之, “三因子代表了文化的结构部分, 八方面代表了文化的功

能部分;结构是静态的,功能是动态的;结构是形式,功能是内容”。^④吴文藻在接受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理论之后又加以创造,这就是上文他在自己阐发社区研究的文化内容方面发展出来的文化四个方面。

对于上述文化内容在社区研究中的位置,吴文藻认为“社区”在比较的层面上是具有“各自倚重的文化本位的”,所谓“文化本位”亦即“文化的重点”。^⑤这也就是第二部分讨论的吴文藻的社区类型学划分的意义。在吴文藻的框架内,边疆、农村、都市这三种社区类型学的划分之所以能够成立,就在于这三种社区各自倚重的文化本位或文化重点不同:这种不同在物质层面的经济产业上最为明显——游牧业、农业与现代工业。但物质层面仅仅是这三种社区文化的基础,这种分类还意味着这三种社区在社会组织、精神生活上的不同,从而形成游牧文化、农业文化以及工业文化这三种不同的文化本位,亦即三种不同的文化重点。作为中国的社会学学者,吴文藻从其特有的学科眼光出发,以不同文化本位的社区的并存来提高对当时中国社会的复杂把握。社区研究不仅仅是要考察某一个社区的文化整体,也不仅仅是要弄清某一类文化的社区状态,而是要从比较的角度出发来同时囊括进多种文化本位,进而为中国社会表现出来的问题找到一个总体解释。

四、吴文藻的余音——燕京学派及当下

吴文藻先生除了一直大力倡导“社区研究”,还进行其他重要的工作——授课、培养人才(请国际大师讲学,派优秀学生出国深造)、学术研究(评介西方社会政治思想理论、社会学中国化、应用功能派人类学理论),因此在完整的社区研究实践上面吴文藻并无特别成果。特别是1942年离开云大到1951年从日本回国这一段时间里,吴文藻甚至一直未接触学术活动。将他的“社区研究”的理念实践并形成传统的是他的学生——费孝通、林耀华、黄迪、瞿同祖等等。由此形成了民国时期中国社会学界的“燕京学派”。

将文化要素进行整体分析的原则一直贯穿在这个学术群体的研究之中。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以研究中国东南农村的乡村丝织工业而闻名,费孝通的敏锐就在于他看到这种经济产业形态奠定于

中国东南农村的家庭亲属制度的基础之上。林耀华在《金翼》中以张、黄两大家族的纠葛展现了中国的农业社会在受到商业经济冲击而产生的错综复杂的情况。黄迪写作的《清河村镇社区》一文更加清楚地贯彻了“社区研究”中的文化整体观:对于村庄社区的经济、婚姻、亲属、宗教、教育、政治等功能的文化面向以农家、商店、庙宇、学校、地方社会组织等多重社会结构为载体进行讨论,从而达成理解这个具体的乡村社区的可能。瞿同祖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虽并非典型的“社区研究”,但其将中国的家庭制度与结构、儒家的伦理思想以及中国法律的演变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为我们理解中国社会史开辟了一条新路径,其中还能看到“社区研究”提倡的文化整体论的影子。

上世纪80年代,社会学恢复重建之后,费孝通先生所继承的兼具社会学与人类学的“社区研究”路径深刻地影响了一代社会学人。时至今日,在众多中国社会学界公认的高水平的经验研究成果之中,如《大和移民上访的故事》、《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等等,我们还能看到燕大“社区研究”的影子。但是随着中国社会学界在理论与经验研究两个方面国际化水平的不断提高,“社区研究”背后带有浓厚历史哲学和现代性味道的社会形态学基础被不断地解构,同时它那“文化表格”式粗糙的经验研究方法因其过于“主观”又被现在不断追求精致、科学、客观的研究者诟病。时至今日,社会学界已经几乎没有人如同吴文藻、费孝通等燕京学派的先辈那样,试图用“社区研究”与“文化”作为中国社会学的主要研究范式去整体地研究、解决中国社会问题。

通过这篇文章,我们重新回顾吴文藻开创的“社区研究”传统,目的是从吴文藻的社会思想入手,去考察他自身的学术脉络与结构,进而为我们理解他的“社区研究”的内涵与意义提供一个新的线索。当我们把他的思想框架与内容充分展开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吴文藻的复杂性使得我们不能仅仅在社会学学科框架下,从“社会学中国化”和“社区研究方法引介”的传统角度去理解他的思想。此外,继承吴文藻先生的“社区研究”范式与“文化”概念,将有助于我们摆脱目前社会学研究过于细碎化、缺乏整体观的境况。“社区研究”背后的社会形态学划分或许还有进行商榷的

余地,但以“文化”作为现实经验的收集与分析基础有利于研究者打通各个社会制度、社会现象研究之间的界限。它让我们看到,政治、经济、家庭、宗教等诸多范畴在社会现实层面上的相互影响,避免社会学走上精致而细碎的道路;让我们既能够扎实精细地进行现实的经验研究,又能够从繁琐的社会现实中抽身出来对整个“国家”与“社会”有整体的把握。

当然,“社区研究”也并非无可指摘。在研究对象层面,社区研究通过“文化”来把握社会现实固然能够将不同的社会制度进行整体提炼;但是社区研究的前提,即以社会形态学为基础的多类型社区个案选择本身有很大的风险:社区研究只是将社区个案内部的多维度文化现象进行透彻的分析,而这些文化现象的功能发挥并不能仅仅在社区个案内部获得解释,研究者还需要进行扩大范围的地方多社区研究才能将社区个案内部的文化现象解释清楚。受到派克那带有历史哲学色彩的社会形态学影响,吴文藻先生过于强调工业社会、农业社会、游牧社会的各自相互独立性而忽视了它们在中国这个共时态空间下的互动。我们如何在继承社区研究的长处同时改正上述缺陷是我们未来要面对的艰巨任务。

注释:

①卢晖临、李雪:《如何走出个案——从个案研究到扩展个案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②王明珂:《父亲那场永不止息的战争》2012年版,第55页。

③阎明:《一门学科与一个时代:社会学在中国》2004年版,第12页。

④吴文藻:《吴文藻自传》1982年版。

⑤王铭铭老师对此有过详细的讨论,参见王铭铭:《“村庄窥视法”的谱系》,见王铭铭《经验与心态——历史、世界想象与社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4~193页。

⑥⑦⑧吴文藻:《〈派克社会学论文集〉导言》,载于《论社会学中国化》,第195页。

⑨⑩⑪⑫⑬吴文藻:《社区的意义与社区研究的近今趋势》,载于《论社会学中国化》1936年版,第432、440、434、436、442页。

⑭⑮吴文藻:《现代社区实地研究的意义和功用》,载于《论社会学中国化》1935年版,第435、433页。

⑯吴文藻:《社区的意义与社区研究的近今趋势》,载于《论社会学中国化》1936年版,第460页。

⑰吴文藻:《中国社区研究计划的商榷》,载于《论社会学中国化》,第468页。

⑱⑲吴文藻:《〈社会学丛刊〉总序》;《论社会学中国化》,第4、5页。

⑳吴文藻:《中国社区研究计划的商榷》,《论社会学中国化》1935年版,第463页。

㉑吴文藻:《功能派人类学的由来与现状》,载于《论社会学中国化》,第209~233页。

㉒㉓㉔㉕三因子:物质底层、社会组织、语言,八方面:经济、教育、政治、法律秩序、知识、巫术宗教、艺术、娱乐。《论文化表格》,载于《论社会学中国化》1938年版,第273、277、311、312页。

参考文献:

1.卢晖临、李雪:《如何走出个案——从个案研究到扩展个案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2.王明珂:《父亲那场永不止息的战争》,中华书局2012年版。

3.王铭铭:《“村庄窥视法”的谱系》,载于《经验与心态——历史、世界想象与社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4~193页。

4.吴文藻:《论社会学中国化》,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

5.吴文藻:《〈派克社会学论文集〉导言》,载于《论社会学中国化》,第189~199页。

6.吴文藻:《〈社会学丛刊〉总序》;载于《论社会学中国化》,第3~7页。

7.吴文藻:《现代社区实地研究的意义和功用》,《社会研究》1935年第66期;载于《论社会学中国化》,第432~438页。

8.吴文藻:《功能派人类学的由来与现状》,《社会研究》1935年第111期、第112期;载于《论社会学中国化》,第209~233页。

9.吴文藻:《社区的意义与社区研究的近今趋势》,《社会学刊》1936年第5卷第1期;载于《论社会学中国化》,第439~461页。

10.吴文藻:《中国社区研究计划的商榷》,《社会学刊》1938年第5卷第2期;载于《论社会学中国化》,第462~478页。

11.吴文藻:《论文化表》,《社会学界》1938年第10卷;载于《论社会学中国化》,第269~332页。

12.吴文藻:《吴文藻自传》,《晋阳学刊》1982年第6期。

13.阎明:《一门学科与一个时代:社会学在中国》,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责任编辑 董希望